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德里达 Derrida

[英国] 西蒙·格伦迪宁 / 著
李永毅 / 译

非外借

[英国]西蒙·格伦迪宁 著 李永毅 译

德里达

牛津通识读本 · _____

Derrid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里达 / (英) 西蒙·格伦迪宁 (Simon Glendinning) 著; 李永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3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Derrid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7616-5

I. ①德… II. ①西… ②李… III. ①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1930—2004)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2134 号

Copyright © Simon Glendinning, 2011

Derrid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1.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27 号

德里达 [英国] 西蒙·格伦迪宁 / 著 李永毅 / 译

责任编辑 何本国
装帧设计 景秋萍
校对 李娟
责任印制 董虎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毫米 × 889 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4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7616-5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序 言

杜小真

任何哲学都是对哲学史的解释,对其矛盾的解释,是通过哲学行为的超历史意义对其统一可能性的证明。

——保罗·利科^①

有幸得到译林出版社何本国先生惠寄的李永毅教授移译的《德里达》书稿。这部英国学者“书写”的研究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大师德里达的力作,让我这个从事法国哲学教学、研究多年的中国教师感到亲切,有话要说。

首先想说的是,书稿封面上作者西蒙·格伦迪宁(Simon Glendinning)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也由衷地对之怀有敬意。因为曾经读过当时社科院江怡教授的一篇《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话的现实性分析》^②的文章。江教授在文中谈到,20世

^① Paul Ricoeur, *Sur "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 de Husserl*, in *A l'école de la phenomenology*, Vrin, 1986.

^② 《厦门大学学报》, 2007年第5期。

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被视作截然不同、长期以来存在巨大鸿沟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江教授在文中就提到了属于“开明哲学家”之列的里丁大学哲学教授西蒙·格伦迪宁，提到了他的（许多中国同行都感兴趣的）《为他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1998）一书。如果说，上世纪末期西蒙·格伦迪宁等英美学者的“变革”突破了单纯哲学的概念术语的讨论、开始重视相关思想和哲学问题及其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那么，西蒙·格伦迪宁2011年出版的这部《德里达》和之前的《德里达的遗产：文学与哲学》（2008），则把这种变革推向更高、更深入的层次。这本书为如何读懂并且理解德里达——这个有人敬爱，有人唾骂、仇恨、丑化的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的“文本”，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应该说这部篇幅不大、文字平实的研究著作，其内涵的深意已超出了德里达及其思想本身。

2004年10月18日的法国巴黎《星期日报》刊登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德里达”逝世的消息，这篇短文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德里达的哲学风靡世界，处处被解释，但是（他的思想）真的被理解了吗？”这真是问到了要害之处。这个问题更应该针对那些对德里达的文本“深感不安”的敌对者和“误估”、“低估”德里达学术地位的圈内的“仇恨者”。其实，理解或评论一个学者及其思想，最可靠的依据就是他的作品，德里达曾经呼吁：“要理解我吗？请读我的书吧！”西蒙·格伦迪宁的这部著作极力张扬的就是德里达文本的重要性，也是依据文本理解——并引导读者一起理解——德里达及其思想的典范之作。作者准确地理解并践行德里达的“文本”观念。他强调从

“德里达文本”出发，就是告诫读者不要将“作者的地位过于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本、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也就是说，文本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文字，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作者和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挚友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同样认为“（德里达）敢于颠覆表面的话语直至解构话语没有说出的前提……打开了阅读我们文化的文本的全新道路”^①。文本的重要和优先地位，是德里达整个思想脉络和解构思想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他的解构思想核心，即“书写”理论的最可靠的依据。

西蒙·格伦迪宁教授认为，那些对德里达怀有敌意、对德里达及其思想“误估和低估”的学者，大多也是因为缺失了对德里达“文本”的正确理解。诚然，这其中对“欧陆哲学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但格伦迪宁教授说得对：诸如“剑桥事件”一类的不公正的判决和诋毁，背后的事实竟是没有真正读过德里达“文本”，甚至“未曾从他的著作中援引只言片语”，缺失“文本”的分析，结果造成带有主观意向的偏见，并以此在德里达的概念意义强加上远离其“初心”的解释和评论。其实这是不懂得“德里达文本的雄心是给哲学一个未来，但这个未来绝非哲学通常为自己设计的那个未来”。格伦迪宁教授不但深深意会这个雄心，而且向这个“最终目的”努力前行，他“勇敢”承认自己就是所谓“青年时代乃至后半生被德里达‘腐蚀’的那些人中间的一员”，他公开宣称“与他为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把“剑桥现象”视作类似“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

^①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 in *Rue Descartes*, PUF, 2005. p. 14.

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时的普遍心态。格伦迪宁教授的思考让我们想到,理解和评价一位学者的首要步骤是阅读他的“文本”。德里达的文本是“存在之客栈”,“不是一个原子,而是一个好客的节点”。文本不是语音的记录,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文字集合,而是脱离语言系统、阅读工作不能超越、真实生活铭写在其中的东西。^①

格伦迪宁教授关于“继承”的问题的见解和分析也让我感到亲切。他深切领会到“德里达文本”之所以大大激怒那些自以为是哲学学科“合法继承者”的“不满者”和“批判者”,根本原因是德里达背叛了传统逻格斯中心论的“文本”的“现成在场”,即背叛了所谓的“永恒真理”和“木已成舟”的结论。其实,“哲学并非只有一位合法继承者”,继承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化约为被动接受某种现成可用的东西(某种让我们强烈感觉到的、预先给定的东西)”。正如书中译注所示,“德里达强调了传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因此继承必然意味着选择……这个决定也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因此继承也必然意味着责任”(正文第19页译注^②)。格伦迪宁教授有关继承的述评,非常接近法国当代一些哲学家的思考。比如法国哲学家布鲁斯·贝古(Bruce Bégout)在谈到利科与现象学的关系时就称他为现象学的“变异继承者”^③。利科本人也说过:“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

^① 在此,不禁想到已故旅法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关于书法的思考,或许能够让我们与“德里达文本”沟通。熊秉明先生曾经有“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中之重”(《老年书法班》讲稿)的说法,他讲到唐人孙过庭的“人书俱老”的哲学意义:创造与存在的微妙的一致。人自己书写出来的字迹其实就是曲折人生道路的记录:“人即书,书即人,我们一生所写的字,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的字迹。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字,即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老年书法班》讲稿)

^② 参见 Bruce Bégout, *L'héritier hétérologue*, in *Esprit-La pensée Ricoeur*, No.3-4, 2006, pp. 195-209.

胡塞尔各种变异的历史。”^①

另外一位学者在分析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贡献时指出，两位哲学大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同时体现了对胡塞尔的忠实（继承）和断裂（变异）。^②这并没有取消他们的现象学起源，但如德里达所说，从解读一开始，就偏离了“起源”。这不也是德里达解构思想所希望的吗？德里达是在解读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遗产，“‘以特定的方式’栖居在哲学传统内部……以求阐明它内部那些将它带往另一个方向、给它一个未来的运动”。换言之，继承一种传统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接受其学说，而同时从一开始就划出了与之的界限，就开始阅读这个世界，并渐进深入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意义，让这个世界说出它不愿说出的东西。这看起来是偏离了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正是对一种传统过于忠实，才会产生看似完全“不忠实”的结果。对“理性”召唤的“忠实”的服从，对某种精神传统、经典文本的“忠实”继承，不应该是对理性顶礼膜拜、不容对其“权威”提出任何问题和质疑，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异端背叛”……针对这样的“忠实”继承，德里达主张的是以问题回应理性的召唤，力图透彻理解理性的召唤。德里达实施的是变异的继承，与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一样，他是西方理性思想传统真正的“忠实继承人”，也是真正的“捍卫者”。

可以说，格伦迪宁教授正是遵循德里达的解构方向向我们分析和述说德里达。所以他的解读不但对于澄清偏见、误读，对于领悟德里达别具一格的“书写”“解构”“起源”“延异”“播撒”

① Paul Ricoeur, *A l'école de la phenomenology*, Vrin, 1986, p. 9.

② 参见 Agata Zielinski, *Lecture de: Merleau Ponty et Levinas*, PUF, 2002, p. 9.

等诸多哲学概念的真实涵义是值得阅读的导论文本，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成为传承德里达承继的西方人文精神传统的文本解读。格伦迪宁教授的解读还让我们深深领会到德里达这位“忠实的”不忠实继承者内藏的无限魅力，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对精神传统、对世界、对他人、对个体的挚爱。

我常常记起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讲学期间，曾多次对有关“后现代”的提问做出这样的回应：“不，我不属于后现代派！因为我相信启蒙理性！”非常遗憾，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根本。早在多年前，德里达在解释他的解构思想时就说过：“（解构）这是结构主义的行动，同时又是反结构主义的……它不能归于方法（还原），也不是分析，超越了批评观念和决定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解构不是否定的原因。我认为，它永远伴随着肯定的要求，我甚至说，它从来不会在没有爱的情况下进行。”^①这哪里是什么“虚无主义”，哪里是什么“绝对否定”？

我想说，格伦迪宁教授为传承德里达思想精神“书写”的典范之作，李永毅教授用流畅、传神的译笔完成了这部中译本，我喜爱并认真阅读它，大概都是出自对这种“爱”的憧憬？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体会这种“爱”，并且传承这种“爱”。也是为着这种“爱”，我写下以上文字，算不上是“序”，只是出自真心的感想而已。

^① *Entretiens avec le Monde, philosophies*, éd. la Découverte, 1984, p. 84.

致杰弗里和诸位安琪儿

致 谢

若没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学生耐心配合、热忱鼓励，我是无法撰写这本书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哲学基础，德里达对他们而言几乎必然是一个虽有耳闻却极其陌生的话题。但他们愿意犯险，涉足未知的水域，这份勇气让我的教学充满了愉悦。我在此感谢他们的踊跃参与，也感谢他们求知的兴趣和惠赐的灵感。

在我授课或主持研讨班的过程中，不少我钦慕的德里达专家都读过或听过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我尤其感谢杰弗里·本宁顿、约翰·科廷厄姆、罗伯特·伊戈尔斯通、马里安·霍布森、佩吉·卡慕夫、奥伊辛·柯奥哈涅、斯蒂芬·穆尔哈尔、安东尼娅·庞特、杰克·雷诺兹、尼科拉斯·罗伊勒和亨利·斯塔滕，他们都曾提出建议或与我讨论。我也要感谢出版社的审稿人，他们阅读了书的初稿，指出了我的不少错误和理解不当之处。

最后，我要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爱玛·玛尔尚和

彼得·芒齐洛夫表示谢意,是他们确保我的这艘船没有偏离航向,顺利抵达终点。

西蒙·格伦迪宁

2011年于伦敦

目 录

致谢	1
第一章 德里达的照片	1
第二章 对德里达的误估和低估	9
第三章 解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遗产	33
第四章 转向书写	48
第五章 延异	60
第六章 可复现性	75
第七章 政治与正义	86
第八章 人与动物	108
第九章 从头再来	120
索引	122
英文原文	127

德里达的照片^①

谁更忠实地服从理性的召唤,更敏锐地倾听它的声音……
是以问题回应理性、力图透彻理解那种召唤何以可能的人,
还是对任何质疑理性本身之理性的问题都充耳不闻的人?

——雅克·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解构哲学运动之父^②,诞生于埃尔比亚尔(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繁华小镇)的家庭度假房里……
可是让我们暂且打住。

① 由于本书原文的文风受到了德里达缠绕晦涩文风的很大影响,所以为了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译文虽然系统采取了语义明晰化的策略,也竭力追求自然流畅,但在很多地方仍不得不扭曲汉语的使用习惯,例如杜撰词语、使用冗长繁复甚至难以卒读的定语、大量使用括号和破折号(因而读者需要适应一种多线程阅读),等等。建议读者先读最后一章中德里达的话以理解本书应采取的阅读策略。——本书的注释均由译者添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② 德里达对自己哲学的称谓是“解构”(法语 *déconstruction*, 英语 *deconstruction*),他的反对者更倾向于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 英文里的 *ism* 常含贬义)这个词,在中国学术界,“解构主义”和“解构”的差别更多的是名词和动词的差别。但在本书的译文中,“解构”对应于 *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对应于 *deconstructionism*,特此说明。

我们可以回到哲学家生平的常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便没有后面的一切。但是本书介绍的这位哲学家却希望我们径直向前，别太关注这样的起点，别去留意作者（人们心目中存在于作品背后的创造之源）的角色。

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思想者一方面绝不轻易乞灵于作者之名和“血肉之躯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的大半光阴用于阅读和讨论一些（尤其是哲学史上的）独特人物的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这个名单很长。他的思想几乎总是以“某某人的文本”为出发点和跳板的。有些人曾认为，这其实体现了哲学中一种更普遍的趋势：论者常说，所谓的“欧陆哲学”首先关注的便是作者之名，英美分析哲学却对问题本身更感兴趣。然而，我们只需稍稍浏览“德里达文本”便会发现，这种解读颇有问题。例如，德里达在早期代表作《论书写学》中坚持认为^①，他将“标示性价值”赋予“作者之名”或者名字代表的“信条”（例如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卢梭主义），不过是“凸显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认为作者之名或者指明了一个“起源”或“起因”（正是它引发了形而上学历史上出现过的历史性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历史性更替^②），或者概括了“结构的简单效应”，就

① 法文标题为 *De la grammatologie*，汪堂家中译本译为《论文字学》，值得商榷。“文字学”的译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小学”，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德里达关注的内容是语言学的子领域。事实上，德里达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语音与书写的关系，词根 *gram* 在古希腊语中也是“书写”的意思。

② “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的语汇中指与解构相对的西方哲学传统。“历史性结构”指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历史性更替”指一种主导思想体系让位于另一种体系。

过于天真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会翻倍，因为德里达希望阅读的哲学史上的名著本身就是在这种天真理解的藩篱内诞生的。两种力量相互对峙，一面是伟大作者和伟大运动的效力，一面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性结构，这种观念深植于他所质疑的形而上学的核心。

我们在后文将看到德里达如何设法应对此问题，至少在使用（虽然只是临时性地）他质疑的观念框架时有所收效。眼下我只想强调“德里达文本”对读者的某种告诫，就是不要过于简单地理解这个短语的含义，也就是说，不要将作者的地位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本、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摒弃这样的观念，仿佛我们有某种更恰当的观念。所以，若要有效地保持这种警觉，就只能与传统的天真观念博弈。例如，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说法：雅克·德里达是解构哲学运动之父，他生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愿意聆听“德里达文本”的教诲：我们不应太天真地依赖我们借以理解此类似乎不言而喻的说法的那些观念。

简言之，面对雅克·德里达的传记时，我们永远不可忘记，这位传主对传记这种体裁曾有许多论述。事实上，他一贯坚称（尤其是针对哲学家的传记），以为只要简单参考这些“‘血肉之躯’的真实生活”就可以成功解释“某某人的文本”，这样的想法几乎毫无价值。

当然，雅克·德里达的确有血肉之躯。即使你未曾见过他本人，至少你也会在网上看到他的许多照片，在本章末尾也有他的一幅很传神的照片（后面我还会提及）。想象一下，你正在

浏览其中一些照片，那么你每次看的都是某人的一个影像——它为他生活中某个此时已经消逝的“此时”保存了一份视觉记录——而此人此时其实已经死了（无论你的“此时”是何时，我都敢肯定这一点）。虽然这样的图像在当今可以立即生成并发送，但这不可避免的耽搁，无论它多么短暂，都足以让任何人的照片**可能**面临上述这种现实——也就是说，你面前这幅照片里的人此时**其实**已经死了。这种可能性也总会触发某种文学化的哀恸。哲学家科拉·戴蒙德对特德·休斯^①诗作《六位年轻人》的解读就传达了这一点：

抒情主人公坐在熟悉的地方，看着一幅照片，里面有六位微笑的年轻人……他们浑身散发着活力，一位羞涩地垂下眼睛，一位嚼着一棵草，一位“自命不凡，有些滑稽”。拍完照片不到半年，这六个人都死了。

另一位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②反驳说，戴蒙德的文字所唤起的“脱位感”其实并不需要以突然的天亡为条件，事实上，“即使这些年轻人一生美满，寿终正寝，我们也可抒发同样的情绪”。我想德里达很可能补充说，这种“脱位感”甚至无须等到他们事实的死亡。一个人死亡的**可能性**（即这种可能性：我可以断言，从此时起，每一个此时你或许都在看一位死者的照片），某个血肉之躯“绝对消逝”的可能性，始终笼罩着影像和照片，

① 科拉·戴蒙德（1937— ），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语言哲学。特德·休斯（1930—1998），和拉金并列为英国二战后最杰出的诗人。

② 英国哲学家，牛津哲学和逻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